

梁慕嫻 訪問原文精華抄本

(以下為訪問原文，內容未經考證；部份內容的考證可參考研究員整理後的文稿。)

梁：學友社在1949年成立，當時是中國共產黨已經面臨取得勝利的時候，許多香港市民紛紛表現得情緒高漲，很嚮往共產黨的勝利，所以當時香港有三十八個此類團體，分別屬於舞蹈、唱歌、合唱團、中樂等，什麼種類都有。但當時是港英政府執政，港英政府看到這個趨勢，意思是共產黨的意識型態、藝術生活對香港人的影響大，所以港英政府就要取締這三十八個團體，而學友社跟「業餘音樂研究社」是兩個「倖存」的團體。那個時候，學友社的名字是「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」，初時大概有九十幾個成員，我在1956年參加了學友社，那時還未有一個完整的舞蹈組的。當時有一個人叫歐陽榮生，他就領導了一個「領舞組」，在社內主要舉辦土風舞（活動）每逢星期六晚上就會有個常會，或者我叫它為「歌舞集」，唱歌、跳舞、集體遊戲……「集」就是集體舞、集體遊戲的意思。那時候我在那裡跳得很開心，跳了各國的，什麼匈牙利舞、青年友誼圓舞曲一類。這種舞的特點是大夥兒圍圈，或者圍成四方形，交換舞伴之類，很好玩。經過這樣，舞蹈組成立，主要三個人，一個就是柯其毅，他當上了組長，一位是陳維騫，當了副組長，還有一個是余東生，三個人的編導組。他們三人都是跟隨那位西人芭蕾舞老師學習，我不知道你們能否查著，我現在上網已經查不到了，那位老師叫Azalea Reynolds

梁：柯其毅1952年加入Azalea Reynolds School of Ballet。在那段時間，這所學校是很好的學校，不是光教，還組織演出。柯其毅當時說，剛去這所學校時只有三個男生，當時沒什麼男生會跳芭蕾舞，所以當這所學校舉行演出的時候，他自然成為男演員，所以他在1955年演出了《林中仙子/仙凡之戀》，節目中就只有他一個男演員。然後他在這類舞蹈活動、演出中認識了很多喜歡舞蹈的男男女女，尤其是女生，其中有一個跟他一起跳舞的女生就跟他說：「你那麼喜歡跳舞，有沒有聽過學友社？」。1959年，就在芭蕾舞學校搞了一個《天鵝湖》演出，他又是劇中唯一的男演員，所以就演裡面的王子。這個演出對於他在芭蕾舞裡面的認識起了很大作用。陳維騫也有參與這個演出，他好像是演魔鬼。當時芭蕾舞學校的圈子都是香港的西方人。

梁：柯其毅與陳維騫、余東生組成的編舞組在學友社擔起舞蹈組的工作後，我認為他們的確作出貢獻。他們的貢獻不是作了藝術上很大的創作，而是做了很重要的普及工作，在這方面來說是一個成就。初初第一場演出在1959年上演，學友社的十週年紀念之時，在香港大舞台演出。那場演出已經包含了他們初時的芭蕾舞表演，有《天鵝湖》雙人舞，好像是請了一個姓黃的女生來跳，當時社內還未有演員能演。加上陳維騫熟悉各國的民間舞，所以中間也包含很多民間舞的節目。但當時還未有中國舞，楊偉舉還未來，所以那場演出比較單薄，但就已經是這個編導組的第一次演出了。

梁：整個學友社在1959年和1966年之間其實是辦了很多演出，現在算起來一共有三屆舞蹈公演，三次應《華僑日報》邀請為「救童助學運動」義演，又有三次綜合性演出，又有三次為籌永久社址基金的演出。多數表演的演出地點是普慶戲院、娛樂戲院和後期的大會堂音樂廳。最令我懷念的是後來上演的《仙羽神弓》，這一場是在大會堂於1962年剛剛落成時上演，整個樂隊成員有近三十人負責伴奏，是一場三幕五場、中國古裝神話大型舞劇。當時的情況是，台前幕後加起來至少有一百五十人，由楊偉舉自己編導和做男主角，這一場戲該是他最高峰的一個節目了，學友社這方面是有理想、有有心人想幹些什麼。

梁：學友社在那段時間舉辦了很多演出，而我的角色，最初有參與跳舞，我有演出，也有上芭蕾舞的基礎訓練，後來領導叫我不管管跳舞；當主席該做多一點行政及思想工作，因此後便沒有跳……

梁：1962年，學友社的地下黨領導就調了一個新的領導人來學友社，他就是盧壽祥，當時盧壽祥來了之後，就要我們核心領導小組學習毛澤東的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這篇文章。這篇文章經過學習後，整個學友社就起了很大的變化。這篇文章主要的問題是認為文藝要與工、農、兵結合；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服務，這就是核心。就像楊偉舉，他就不再搞剛才那些舞劇，轉而搞了一個舞劇叫《風雨黎明》，非常階級性，當時香港好像有水災或是大風雨，就講窮苦的人如何在水浸之中受苦，然後毛澤東思想就光輝照耀，看到前途希望的故事。柯其毅也改變了，有一首歌叫《山丹丹開花紅艷艷》，他就用這首音樂排芭蕾舞，演員們全就紮起頭巾，穿著像大襟衫一類的民族服，這種風格就叫「回歸民族」。話劇導演張懷就開始辦他的一些「階級節目」，他不是舞蹈組的，是戲劇組。戲劇組在暴動的時候，組織了一個「文藝戰鬥隊」，簡稱「文戰隊」，他們真的會「戰鬥」，當時在北角那裡演了十多分鐘戲，真的在那裡握起拳頭、紮馬，做起很多革命動作。演完就有一群工人護送他們離開，這就是「文藝戰鬥隊」，我的書中也有提及。其中有一齣讓我至今也覺得很難受的，就是文藝戰鬥隊組織了一些學生、青年人排練了一套獨幕話劇叫《毛主席恩情比海深》，我到現在還有那份劇本，曾在《文匯報》上刊登，可以說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頂峰之作。這部就是楊偉舉及張懷；當時整個學友社完全改變了，變成排這些東西。

梁：六七暴動後，學友社完全無法再舉辦任何演出，因為港英不批准，大會堂音樂廳不批准我們演出。我們就在想辦法，決定繞過一條路，第一就是以柯其毅的名義主辦演出，我有場刊作證，於是就能在大會堂繼續演，如果以學友社的名義就不批准，於是我們就改了一個名字叫「藍鳥」，變成什麼「藍鳥主辦」、「藍鳥演出」，就去了港大的陸佑堂演出。當時有一件讓我很懷念的事就是，可能當時的學生也撥亂反正，當六七暴動把情況推至最極端後，一停下，地下黨開始不干涉了，叫我們繼續搞演出吧，所以我們就要衝出重圍，搞這些演出。在陸佑堂那次演出，我們有個叫輕音樂組是學結他一類樂器的，那個組在當晚的演出就是“Blowing In The Wind”，我一生人第一次在我負責的學友社演出裡聽到這首歌，這歌我一直懷念至今，對這首歌很有感情。

梁：我在學友社辦過很多演出，但是我認為我只是一個組織者，不是一個製作人。當時不是由我去建立整個演出的意念，是由舞蹈組決定，我只是負責組織，像是安排服裝組、票務組的人手、分配工作，所以我只是一個組織者，我覺得自己未有完整完成（我的心願）。於是到了1994年，我有力的時候，我就想完成心願，思考一個製作人應該要做什麼、怎麼做，於是我就一場一場表演接著辦，就在中華文化中心「舞蹈協進會」的第一場演出，就是中國藝術團來溫哥華演出，我們當初負責接待她們。第二場演出，就聯繫了一個去了西雅圖的中國舞蹈家，他叫李恆達，他就是北京舞蹈學院鄧大琨的學生，他就在西雅圖組織了一個舞蹈團，那我就邀請他們這個團來溫哥華演出，當時溫哥華沒什麼人會這樣做，於是這個演出就是由我們「舞蹈協進會」主辦，那時候就認識了很多當時活躍的舞蹈家，我就很開心，因為一場辦得比一場圓滿，愈來愈能完整地完成我的心願。